

中国教育学刊 2004 年第 1 期

中国教育两难问题

· 1 · 启中平 陈东升 著

湖南教育出版社

中国教育问题研究丛书

中国教育两难问题

寇中平 陈东升 著

责任编辑：龙育群 张汉芳 翦开明

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东风路附1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厂印刷

810×1138毫米 32开 印张：11.63 字数：230,000

1995年11月第1版 1995年11月第1次印刷

ISBN 7-5355-2256-4/G·2251

定价：15.60元

本书若有印刷、装订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顾问：瞿葆奎

主编：张诗亚

编委：(按姓氏笔划排列)

冯增俊 龙育群 李小融

张汉芳 徐 辉 徐新建

扈中平 黄新宪 黄显华 (香港)

傅维利 程方平 翦开明

序

1983年,《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召集有关教育学家以及社会科学家们讨论了中国教育科学的现状以及发展的问题。在该刊1983年第5期与第6期连续两期的头版头条,发表了题为《教育科学应该有一个大发展》的专题讨论会的综述。

1980年底至1989年初,《光明日报》社又以《打破教育理论沉闷状态,繁荣教育科学》为标题,就中国教育科学理论的发展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从1983年《中国社会科学》召开的《教育科学应该有一个大发展》的专题研讨会,到1989年初《光明日报》上举行的《打破教育理论沉闷状态,繁荣教育科学》的学术讨论,其间经历了将近6年时间。而从1983年到现在,则已有了11个年头,回顾一下这期间教育科学理论的历程,当是很有意思的。

在《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的研讨会上,学者们表现出了两大强烈愿望:

一是对建国以来中国教育理论发展的强烈不满,并在此基础上产生了对此进行深刻反思的自我意识。

例如,黄济先生指出:“过去不仅把教育学搞成语

录汇编，而且还把它搞成教育政策法规汇编，这就从根本上颠倒了教育科学理论与教育政策法规的关系，教育政策法规不是以教育科学、教育规律为依据，相反，却成了教育科学研究的根据和出发点，甚至成了它的全部内容，其结果只能是取消教育科学与研究。”^①

再如孙喜亭先生说道：“……教育学的学科体系人称‘四大块’：总论、教学论、德育理论、学校行政管理。这是苏联凯洛夫教育学的体系。我们沿用了三十多年，至今没有大的突破。”^②

二是对建立和发展具有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的教育科学理论体系的强烈向往，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不少有益的建议。这一点可从这次研讨会鲜明的标题——《教育科学应该有一个大的发展》上看出。

思想解放了，目标确立了，然而，结果又如何呢？

事隔6年的《光明日报》的讨论竟在呼吁“打破教育理论的沉闷状态”！

大发展没像“应该”的那样到来，反倒出现了需要进一步打破的“沉闷状态”，岂不怪哉！

当然，在此时间内，教育理论界并非了无声息。《教育评论》、《教育研究》、《中国教育学刊》等不少教育类的刊物都有关于这一主题的讨论。或要求改变观念，或主张思想解放，或倡导面向世界，其重要的结论都是要建设“具有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的教育科学理论”。而《中国社会科学》以及《光明日报》等的讨论，

^{①②} 李克敬整理：《教育科学应该有一个大发展》，《中国社会科学》1983年第5期。

则意味着这一愿望已大大溢出了教育学术界的范围。

客观地说，这些年来，中国教育理论界的学子们也并不是没有为促使教育科学的大发展努力，以下出版的书籍即可见一斑：

四川教育出版社推出《现代教育丛书》；

江苏教育出版社又推出《当代教育新理论丛书》；

辽宁教育出版社跟着推出《现代教育科学丛书》；

上海教育出版社推出《中国文化与教育》丛书；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教育科学丛书》；

江西教育出版社推出《战后国际教育研究丛书》；

人民教育出版社推出《教育学文集》、《师范教育丛书》；

湖南教育出版社推出《教育探索者》丛书、《晏阳初全集》、《陶行知全集》；

.....

凡此种种，不一而足。这还仅是笔者从自己的书架上信手拈来的。应该说，这些年中国教育理论界在构筑“中国特色的”教育科学理论体系方面着实下了一番功夫。仅从上述的各类丛书看，或构筑一门学科体系，或梳理若干史实，或横向比较别国，或介绍外来新理论，或运用各种新学科来研究国内实际，均作出了不少贡献。比较万马齐喑的年代，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

但是，如果我们对照一下中国教育现实的发展，如果我们用中国教育理论应该达到的水准来要求自己，如果我们比较一下那些获得实验科学支持的别国教育理论，甚至，就同国内社会科学的其他领域，如经济学、历史学、哲学、文化学等等比较一下，我们便会

发现，我们面前的路还相当遥远。

对此，刘佛年老先生曾有一段语重心长的话：

“教育改革只有在科学的教育理论的指导下才能不断引向深入。虽然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教育理论工作者已经对教育改革的问题作了不少理论探讨，但应该说我们的教育理论研究还是相当薄弱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理论体系的建立决非朝夕可至，可能需要几代人的不懈努力，我们的理论体系才能逐渐臻于完善”。^①

中国特色的教育理论体系是什么？究竟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建立？这一问题从理性上作纯理论的探讨显然是于事无补的。从理论出发，无论是舶来的如“老三论”（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新三论”（耗散结构论、突变论、协同论），或是我们自己“发明的”、“创立的”，或是我们自诩的——如《教育学》迄今就有上百个不同的版本，而几乎每个版本都声称“具有特色”是“自编”的——其结果都是从学科结构出发又回到学科结构之上。写书的人完成了一个体系的架构，读书的人则领略了一个理论体系，厚厚的书本，厚厚的笔记，老让人觉得似有所得，而空空的话，空空的行让人又毫无所得。

从理论或学科结构出发来构造中国特色的教育科学理论体系的努力既师出无名又劳而少功，这一切说明了什么？尤其是当我们面对：

独生子女教育；

^① 张诗亚著：《教育的生机——论崛起的教育技术学》，四川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1页。

扫盲教育；
学校乱收费问题；
教育经费短缺；
教师跳槽；
中学体制改革；
义务教育实施；
高等教育体制改革；
民族地区发展与民族教育；
希望工程；
办学方向争论；
多元文化传承与教育现代化；
教育与经济体制改革的关系；
法制教育，德育，理想教育；
.....

诸如此类，大大小小，林林总总的教育问题，裹挟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全面转型的巨大冲击，铺天盖地而来之际，我们，中国的教育工作者、研究者，又该做些什么？

很显然，我们为了建设“中国特色”的教育科学理论而从理论出发，是犯了一个本末倒置的错误。

现在，这一被颠倒了的本末应该把它颠倒过来了！

我们认为，教育科学研究的出发点绝不应是理论的体系或学科的结构，恰恰相反，而应该是一个个现实的问题。从问题出发，从现实存在的种种教育问题出发，才能真正构成教育科学研究的出发点，并且只有从理论的空中楼阁回到现实的问题土壤，才能生出理论——有中国特色的理论体系，有中国特色的教育科学理论。

本世纪 20 年代，胡适先生曾倡导过：“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此言在当时的背景如何，已是历史，这里不谈。我们在此要说的是，作为一个中国人，要站在中国的大地上，就像安泰从大地母亲那里获得力量一样，研究中国的教育问题。任何有生命力的中国特色的教育理论，只能产生并形成于对中国教育问题的研究之中。

从中国教育现实的重大问题出发，进行深入的实证性的研究，理清其来龙去脉，挖掘其深层的社会原因，并将其置于理论探讨和实践操作的国内外教育发展的比较之中，提出解决问题的对策性意见，从而，为建设植根于中国现实土壤中的中国教育理论体系作出应有的贡献。

这便是我们在对中国教育现实，对中国教育理论研究在过去和现在进行了比较、分析后得出的结论。

这便是我们要在组织编写学科性结构的教育理论丛书之后，再次聚集拢来，编写《中国教育问题研究》丛书的共识。

这套丛书首辑所涉问题，包括基础教育问题、高等教育问题、留学教育问题、教育与就业问题、教育的多方面摇摆现象问题以及教育的战略重点问题。我们知道，这些并未囊括所有的教育问题，甚至有些可能还算不上最重大的现实问题，然而，在我们看来这些确实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我们也知道我们绝不能自诩已找到了解决这些问题的良方。但我们相信，问题既然提出来了，解决的方法就不难找到。当然，这需要大家共同努力。如果读者朋友在读了这套丛书后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将会欣然接受，万分珍

惜；如果读者朋友萌发了对这些问题，或者那些我们尚未提出的问题进行深入探讨的兴趣，我们则更加高兴。因为我们热切期待的就正在于此。

张诗亚

1994年10.26.

目 录

- (1) 导论：困扰中国教育发展的一个根本性问题
- (38) 第一章 教育的政治功能和经济功能的冲突与
 权衡
 - (39) 第一节 两种教育功能间是否有两难
 - (45) 第二节 政治经济挟拥下的世界教育摇摆背
 景
 - (70) 第三节 40 年的中国教育：政治的手段还是
 经济的工具
 - (88) 第四节 中国教育功能为何摇摆不定
 - (105) 第五节 变革中的中国教育何处去
- (113) 第二章 理论培养与实践培养孰轻孰重
 - (113) 第一节 理论培养和实践培养的两难境地
 - (117) 第二节 自由教育传统及其革新中的西方教
 育背景
 - (130) 第三节 前苏联模式下中国教育的波动与困
 惑
 - (144) 第四节 理论培养和实践培养的二元统一性
 - (149) 第五节 理论培养与实践培养结合的具体化
 和中国化
- (161) 第三章 大众教育与英才教育
 - (161) 第一节 大众教育与英才教育的矛盾与困境

- (167) 第二节 西方教育中平等与效率的争论
- (181) 第三节 建国前后我国英才教育与大众教育的历史回顾
- (196) 第四节 影响大众教育和英才教育模式选择的因素
- (211) 第五节 国民素质教育——当代中国教育的新取向
- (221) 第四章 教师与学生：教师权威还是学生自主
- (221) 第一节 教师权威与学生自主的两难境地
- (225) 第二节 西方教育史上几种师生关系观
- (231) 第三节 中国的师生关系观及其摇摆
- (246) 第四节 权威与自主两难的实质及价值互补性研究
- (255) 第五节 中国教育民主化与新型师生关系构建
- (267) 第五章 失衡的天平：集权与分权孰优孰劣
- (267) 第一节 教育管理中集权与分权的两难困境
- (274) 第二节 集权与分权论争摇摆的世界教育图景
- (290) 第三节 中国教育：集权传统及其革新历程
- (302) 第四节 集权和分权结构变革的原因与互补性论析
- (313) 第五节 集权下的分权与制衡：当代中国教育的必然取向
- (324) 第六章 指向超越：对教育两难问题的综合探究

- (324) 第一节 教育两难问题的发生学分析
- (336) 第二节 超越教育两难的方法论思考
- (349) 第三节 决策教育两难问题的实践原则
- (362) 结束语：一个远未结束的课题

导论：困扰中国教育发展的 一个根本性问题

1949年10月1日。北京天安门。一个高亢激昂的湖南乡音宣告了新的人民共和国的诞生。

从此，中国教育走上了一条充满希望，而又遍生荆棘的艰难发展之路。40多年过去了，回首这段历史，我们十分惊异地发现，新中国的教育事业竟经历了那么多的曲折和起伏。矛盾、冲突、对立、动荡，形成了一个个漩涡和风暴，使中国教育象大洋中的小船，在时代浪潮的挟拥下左右摇摆，时常陷入一种两难境地。直到现在，我们仍然能够真切感受到那动荡的余痛和结果的酸涩。

今天，世界不再狭小，人类亦不再彼此陌生。先进的信息技术，发达的交通网络，使地球上的人们紧密相连如一村村民。当我们把目光投向国外的教育，审视它们的兴衰更替，同样惊异地发现，西方教育也是在左右摇摆中行进的。

难怪有西方教育家说，教育中普遍存在着一种“钟摆”现象。

“以古为镜，可以知兴衰；以人为镜，可以明得

失”。实际上，不仅教育中存在着数不清的冲突与抉择，人类社会，每一个国家，乃至每一个人，也无时不处在各种权衡与取舍之中。正是明智的抉择带来了成功和幸运，也正是错误的抉择带来了失败与伤害。在本书中，我们把自己的思考和努力聚焦在对这段摇摆动荡的教育发展史的考察研究之上，就是想从中探索那只影响教育发展的“看不见的手”，为中国教育的发展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让我们首先打开历史的画卷，对40年中国教育发展史中的抉择和动荡作一个简要的回顾和巡视。

一、剧烈摇摆：中国教育的发展轨迹

新中国成立之后，人民教育事业百废待兴。关于如何改造旧教育，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新教育的探索，便在教育活动的各个层面全面展开了。但是，由于国内外形势的左右，以及人们在认识上的问题，中国教育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总处于剧烈摇摆之中，越是欲寻求教育取向的确定性，越是导致教育的不确定，越是欲为中国教育培植稳固的根基，却越是在最后又彻底地捣毁它。

中国教育的剧烈摇摆，首先莫过于对教育的政治功能和经济功能的认识。对教育的政治功能和经济功能的权衡和取舍，是新中国教育发展中最为持久、影响也最为巨大的摇摆现象。建国之初，建设新中国的蓬勃热情和巩固新的政治制度的坚定决心，与落后的经济水平之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和巨大的反差。教育作为改造旧思想，培育新一代建设者的社会动力机构，

究竟应优先发展受教育者的政治思想水平和政治斗争能力，还是优先发展他们的经济生产能力，这个选择的困境，不可避免地要求人们作出自己的回答。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的临时宪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本书中以后简称《共同纲领》）颁布了。作为临时宪法和为中央人民政府所接受的施政纲领，它把教育的政治功能和经济功能并提，没有明显的偏向。但在实际贯彻中，为了改造旧教育，培养具有坚定共产主义信仰的新型人才，同时打破旧社会剥削阶级对教育的垄断，为夺取政权的工农群众谋取平等开放的受教育机会，教育的政治功能实际上变得十分突出了。加之当时中国受到帝国主义的封锁包围和国内残余反动势力的破坏，教育的政治功能愈来愈得到了强调。但政治的开明和社会性质的优越，离不开经济发展这个重要指标。教育的经济功能也不断受到人们的重视，并在教育发展规划中得到了肯定和推行。1956年，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人们面前，教育为生产建设服务的思想便受到普遍的重视。1957年以后，政治形势骤然紧张，“整风”、“反右”运动开始，要求“政治挂帅”，“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的政治功能又得到了强调。1958年开始的“教育大跃进”和学术大批判活动，再使这一倾向得到了强化。到了1960年，带着对“跃进”后果的反思，教育事业开始大调整，教育界批判以政治代业务的作法，要求提高教育质量，密切教育与经济的关系，教育的经济职能再度受到重视。1963年以后，以“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为前导，各种政治运动兴起，教育又走上了政治化的道路。1966年开始

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更是把教育政治化推向了丧失理智的地步。1976年，“文革”结束，教育界开展拨乱反正的整顿工作，教育开始从极端政治化解脱出来。1982年，中共十二大第一次把教育列为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之一，教育的经济功能被公开正式承认并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1986年以后的几年里，随着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开展，教育的政治职能有所突出。1989年的“动乱”平息后，要求加强教育政治职能的思想更加受到重视。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发表之后，教育界形势急转，教育的经济功能再度受到倚重和强调。由此可见，在政治功能和经济功能之间，中国教育真如一只不定的钟摆，在两端之间忽左忽右、摇摆反复。而这种摇摆往往又以“革命性”的彻底立新除旧为特征，中国教育便不可避免地因一次又一次地受到剧烈的冲击而处在剧烈的动荡之中。

在教育过程中，对受教育者的培养是以理论学术培养为主，还是以实践活动培养为主，是中国教育中又一个大摇摆问题。中国传统的儒家教育在其本质上有着十分浓厚的朴素“人文主义”色彩，形成了重理论、轻实践的教育世风。这种情况延续到建国前仍未得到消除。新中国为了彻底根除这一封建色彩浓厚的旧传统，培养手脑并用“有知识有文化的劳动者”，就必须在教育中大兴实践和劳动风气，使学生在实践活动中得到教育和锻炼。但是，学生毕竟是学生，他们还需要掌握大量的现代科学文化知识，劳动过多、活动频繁，势必影响理论知识的学习，而理论学习又不能不受到重视。在两者之间，教育究竟应立于何处呢？《共同纲领》要求采用“理论与实践一致”的教育方法，